



*Strengthening Africa's Economic Performance*

**BRENTHURST 讨论资料**  
**2009 年 2 期**

## 基乌 ( Kivu ) 湖共识

### 一个具有竞争力的非洲的议事日程

#### 摘要

#### 改善非洲竞争力的十大战略

基乌 ( Kivu ) 湖共识是从于 2008 年在意大利和卢旺达举行的两次会议的争论取得的结果。基乌共识确定竞争力是非洲战略增加就业机会和举得盛旺的关键要素。全球经济危机和非洲的人口猛增使得这个任务变得更加急迫。

在这里，竞争力被确定为维护一个让各类企业有利率的、市场付款的货物或服务生产环境的能力

文件提出非洲国家可进行的行动，他们与私营企业，非政府组织，援助者配合来改善本洲的经济竞争力

- 1) **协调改革**：不仅集中对宏观经济进行改革（如贸易，金融和财政政策改革），而且还要对微观经济进行改革，要重视有关税务和政府支出政策，放松企业参与和取消经营活动和其他管理制度
- 2) **减少各项费用，障碍和不确定性**：取消官僚瓶颈，对基础设施和技能的投入，保证法律原则是政府的主要任务。某个国家对卫生，教育和自然环境保护等方面不增强投资就不能维持长久的竞争力
- 3) **准则**：要建立起竞争准则并把其视为比较和减少经营活动费用的方式
- 4) **差异性**：非洲的一些挑战具有区域性的，例如，经济增长比例大幅度依靠原料价格，缺乏基础设施，人力资源素质低和人口猛增等。与此同时，包括改革国家、失败国家、具有丰富的石油资源、缺乏资源国家在内的多种国家的存在，要求竞争战略符合各国国情
- 5) **在投资方面而不是在援助方面的竞争**。让政府花很多时间来进行对投资的竞争而不对援助项目进行谈判。建立起便利化政策，向投资者而不是援助者给与手续便利化
- 6) **建立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处理规则**：通过建立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处理规则来减少麻烦的经营规定，保证对管理调整和税收政策的预计能力
- 7) **把国内改革和援助分开**。非洲政府不应该把自己的经济改革变成受援条件。比如，在经营环境和贸易能力的改革中，非洲政府取得很大的收获，因为关键因素是项目领导和管理能力而不是所举得的钱。
- 8) **维护中要支出**。同国际财政机构进行讨论，以便保证促进经济进步的政府支出不受限制
- 9) **保证金融的竞争力**：对“荷兰病”保持警戒，保证具有竞争力的汇率
- 10) **建立各种增长联盟**：要在经济改革的必要性、高增长比例对摆脱贫困的重要性和国家融入全球经济等方面达成国内共识

非洲各国采取这些行动措施不仅大大地改善竞争力而且还减少大量贫困人口

## 序言：长期的挑战

目前，一个国家摆脱全球化经济所导致的不公正的唯一方式是把自己排除在这场经济之外。因此，为了建设竞争力而进行的改革成为非洲首要任务。没有惟一的一条路可建设经济竞争力的。但所有盼望未来能摆脱受援国身份的国家要考虑并改正阻碍他们参与全球贸易的错误

使各经济体变为更强有力的竞争力的任务空前紧迫。保持经济年度增长率达到5%的高昂货物价格目前大幅度减少了。因为政府的收入来自工业化国家的经营合同，给非洲的援助量也随而减少。此外，非洲各国公民在海外生活寄回国的汇款也减少，而这就是福利和投资的主要来源。

这些事实强调给予非洲出口产品增加价值、政府对技能和体制的投入和改变思路的重要性，让非洲能够全面地融入世界经济。这要求在全非洲范围内建立经济增长联盟，让非洲政策制定者和公民社会组织对作为社会利益力量的私营领域有更清晰的了解。

内在压力也正造成行动和改变的动力。到2025年，每40个世界年轻人有一个来自非洲撒哈拉附近地区，占非洲40%的劳动年龄人口，其中，60%是失业的。非洲贫穷的生活条件和基础服务，加上大幅度的财富不公正造成社会不稳的巨大潜在危机。对非洲妇女的经济边缘化也约束其发展。若非洲妇女和年轻人的能力得到全面的解放，他们将成为推动该陆地积极变化的强有力力量；如果被忘记，他们会成为导致社会和政治不稳的催化剂

25年来，非洲改革议事日程受到援助优惠所驾驶。各项政策按照所谓华盛顿共识建成，强调宏观经济原则（非洲采取这一原则），其中，更重要的是市场自由化（非洲常常回避这原则）。后来的争论一方面面向以管理和体制为中心，其代表是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和区域机构(NEPAD)；另一方面又面向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很清楚地提到的“人力资源”的巨额公共投资项目。最近，非洲目睹了中国的举世瞩目的增长纪律，他们在提问有没有一个能代替的“北京共识”。

### 华盛顿共识

约翰·威廉姆森 是提出“华盛顿共识”术语的人。他是第一个提出很多在华盛顿国际财政体制从事工作的人相信拉丁美洲国家在 1989 年应该采取的 10 个改革领域的人。它们是：财政纪律，改革税收，利率自由化，采用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

根据约翰·威廉姆森的辩论，构成这一“共识”的基础的“三大构想”是宏观经济纪律，市场经济和与世界贸易和投资的开放

摆脱这种辩论，非洲已经为自己划出一个清晰的改革议程而斗争。连绵的经济危机和安全危机使非洲政府的薄弱更加恶化，使得改革计划的制定和展开遇到更大的困难。除了极少个别国家之外，在全非洲范围内没有任何大力支持改革的地区

这一共识达成的过程起源于改善非洲的竞争力是发展的必要性的假设。挑战不为这种需求作出争论，而解释要做的事来实施这一共识。

该共识是 Brenthurst 基金，非洲经济研究集团，南非经营领导协会和 Konrad-Adenauer-Stiftung 基金之间的合作结果。在这一过程当中，已经把参与于 2008 年 5 月 26-28 日在 Villa La Collina-Cadenabbia-意大利，2008 年 12 月 14-15 日在基乌湖- Gisenyi, 卢旺达举行的会议的商人，政策制定者，记者，学者和思想家集聚起来。代表名单请看在附件

### 非洲的竞争挑战

影响非洲发展的最主要障碍是在这里进行经营活动常遇到很多困难。根据世界银行年度经营活动的调查结果表明，非洲是最弱的友谊经营环境的陆地。非洲各国排在第 136 位，与排在第 87 位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相比。保证非洲的未来依靠取消削弱私营领域竞争力的壁垒，尤其是由政府不良的干预所造成的壁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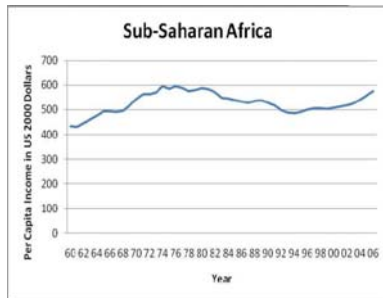
一个国家的竞争力是维护一个让各类企业有利率的、市场付款的货物或服务生产环境的能力。消除各类官僚的拼劲，对基础设施和技术进行投资，保证法律

建立一个具有竞争力的非洲的议事日程

原则等是政府的主要职责。当然不对医疗，教育或者自然环境保护进行投资的国家也不能维持长期的竞争力

在非洲已经发生两个允许集中提高竞争力的变化。第一，民主从取得独立以来空前普遍。第二，最近非洲已经连续五年保持了经济增长，降低反对市场改革

### 非洲经济历史



虽然把 48 个国家概括起来是很难的，但是撒哈拉附近区域国家后殖民地的经济历史分成 3 个阶段。在 1960 年代，非洲各国经济增长并得到自然资源高昂价格的支撑。人均收入于 1970 年代中期达到高峰

随后是经济衰退阶段，延迟到 1990 年代中期，其原因是石油价格，原料价格下降所导致的苏克，加上政府的薄弱政策引起的经济动荡。十五年来，非洲增长比例已经恢复，其原因是得到经济改革的鼓励和对本陆地自然资源的需求。不过，目前非洲的人均收入比 1970 年代的水平还低。

民主本身是很重要的，而且还促进经济和社会的活动。最近的研究结果表明，在过去 20 年中，只有 8/65 专制制度国家获得增长，其中至少三分之一收一年时间的经济下跌。从 1960 到 2003 年，在东亚以外的发展中国家中，民主国家的经济增长比专制国家的经济增长快 50%。

各民主国家通过避免冲突，改善群众对政府支出的监督，使政府有更灵敏的反应等办法来减少支出。民主国家在建设“有责任感的体系”，实施法律规定，对行政权加以监督，制止腐败，把政治忠诚和机会主义分开等方面做得比较好

尤其，能够围绕改革、更好地保持政治共识的民主国家可以辨别成功改革家和滞后失败者。非洲之所以自从取得独立以来变得更贫穷，不是因为收到不好的劝告，而是因为很少国家能在改革和发展私营所有制等内容在国内达成共识。

建立一个具有竞争力的非洲的议事日程

重要改革在政治上遇到很多困难，因为它们要求政府把权威分给市场和私营成分，另一方面它们对有政治联系的得到保护的垄断集团造成挑战

### **墨西哥：安排改革秩序，解决即得的各项利息**

二十五年来，墨西哥实施巨大的转型，自从一个关闭的经济和政治体成为强有力的、具有稳定的金融体系和稳固的经济增长率的民主国家，其经济增长率和资本统筹使墨西哥成为排在世界上十五大经济体的国家。1994年，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墨西哥开始把本国的经济融入美国和加拿大经济体。2000年，Vicente Fox 被选举为总统，这一事件结束革命党的垄断。2007年，墨西哥受到主要在美国和加拿大生活的海外墨西哥公民奇回价值为 240 亿美元的巨额汇款。这笔钱成为最大的收汇来源，对国家贸易剩余做出贡献，此巨额的美元汇款使得比索成为一种强而稳定价值的货币

墨西哥政府在二十年实施经济和政治机构改革的过程，采取了两条路。第一是决定开放本国经济通过参与世界贸易体系（GATT，后来改名为 WTO），与主要贸易合作伙伴进行贸易自由协定谈判并加入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亚太经合组织(APEC)。同时，在知识产权法，司法体系，土地所有制，选举法和财政改革等方面的基本体制调整为一个国家创造强有力的竞争力来吸收外资和融入全球贸易体系等造成坚实基础。最近的阶段，保证法律体系的透明度，做好公共管理工作，保持国有制和非国有制共同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上述墨西哥政治，经济体系的基本变化不仅为北美和拉丁美洲区域内的近邻国家，还为欧洲和亚洲国家创造必要竞争工具。

内在政治事务是所谓成功发展的必要条件的“所有制”构想的核心内容。外行的人不能建立内在政治事务，而且缺少设个因素，任何国家也不能获得成功

### **萨尔瓦多：从香蕉共和国发展起来**

萨尔瓦多的例子正表明，过去不是开头阶段。这个国家可以应付暴利的历史，激烈的政治分级，财富分配的差距，高比例罪犯，依靠农业和砍伐森林等，也可以把区域位置变成战略优势

内战使 75,000 人死亡并造成 50 亿美元的损失，GDP 下降 20%。但是这场内战促进于 1992 年签署的和平协定随后的政治，经济改革，其中承诺民主是在再建设过程中的主要支柱。从此以来，萨尔瓦多坚持追求包括私有化，税收改革，美金化，贸易自由化等在内的经济改革措施。中美贸易自由协议初步取得收获，这项协议取消一切针对美国和中美五国的关税和投资壁垒

萨尔瓦多年均生产总值多年徘徊在 1.5% 以后，目前已达到 5%。政府已利用重要项目来促进增长率。萨尔瓦多快速成为区域航空运载中心，把北美，南美与中美联系起来。萨尔瓦多的投资促进机构已经成功地建立高新工业行业，DELL 已在这设立一个英语-西班牙语的总台中心。此外，全部财政行业被卖给世界上最有名的银行，很多欧洲和美国投资者收购包括啤酒生产厂，泥土生产厂，退休工资基金，保险公司和许多其他领域的企业在内的战略企业，从 2005 以来，投资总额为 30 亿美元

在制定一个积极未来的计划中，萨尔瓦多有很少的选择，同时表明救济首先来自内在。这给结束冲突和增加受援的、有很少的选择的非洲国家加上勇气。一个忍受冲突的萨尔瓦多办得到，为什么他们办不到？

幸亏的是目前非洲已对经济改革采取更加开放的措施。一些最重要的争论包括：建立具有竞争力的汇率的必要性，私营成分的重要性，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越来越减少发生争议可能，甚至当它们没得到彻底解决时。

然而，因为面对南的选择，一些非洲国家已取得利益通过比较新的国内外的投资型式。该陆地的许多其它国家也正开始打下这些基础。

### 格鲁吉亚人的时代

自从 2003 年红色革命以来，格鲁吉亚成为改革模范，在增强自由和改善竞争力的基础上，包括对数千国有工业行业进行私有化，实施新的 15% 的固定税收率（从当初的 47% 调整下降），消除对资本利率，利率，和股息等税收，导致政府的财政收入猛增。格鲁吉亚市场是最开放的市场之一（例如：格鲁

吉亚的进口税率可以与其当改变法律体系时视为模范的新加坡和香港的进口税率相比 )

在减少建设和贸易活动要办的许可证数量，要求政府对每个建议在一定的期限内要给与复答 ( 以两周为常 ) 的基础上，格鲁吉亚的腐败现象空前下降。政府的目的是提供一个让企业繁荣起来而不是促进任何特定领域的经营环境。因而，增长不仅来自旅游等服务业，还来自给韩国市场提供移植服务的意外领域。

格鲁吉亚也是一种经济自由的模式，经常单方采取彻底的改革措施，不怕其后果。格鲁吉亚已向来自 50 个国家的公民取消签证和工作许可证；认可大多数 OECD 和欧盟成员国的技术和质量检查规则，利用财政规定中各项惯例

2007 年，格鲁吉亚被视为世界放松经营活动的有名改革者，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仅仅一年内格鲁吉亚就攀升从排在第 112 位到排在第 37 位，这是空前巨大的进步，2008 年，在 178 个国家中攀升到第 18 位。进行经营活动所需要的许可证减少了差不多十倍。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在 2002-2005 年这一阶段，在所有正转型的国家中，格鲁吉亚是腐败现象减少最多的国家。格鲁吉亚的经济增长率连续几年达到 10%，因而，在 4,500 万人口中，贫困人口比例大量减少，从 2001 年的 54% 到 2006 年的 34%。在经济忍受 2008 年 8 月与俄罗斯战争和全球经济危机的双重打击的背景下，长期繁荣的基础还得以保存。实际上，格鲁吉亚是世界上少数国家在 2009 年预计获得预算剩余。

依格鲁吉亚前总理 Lado Gurgenidze 的话，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也是很简单的：“有固定的税收率，对金融或资本不加以控制，在劳动市场上采取十分灵活措施，消除官僚，腐败等现象，对投资者加以保护”。采取这些措施，发展中国家将不会受到象它们所担心的损失，反而会获得更大的利益

包括象印度和黑西哥低效率运行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表明，改革可以导致增长并向贫困人口提供新的机会。这就给非洲加以鼓励，同时也是一种警告，称非洲与发展中世界的其余部分拖尾。其他贫穷国家所追求的发展战略实际上可以闭关非洲增长的大路，尽管新机会也会在这个过程中产生出来。

### 印度：摆脱 Hindu 增长率

据说，印度经济落入不变的“Hindu”增长率的困境，那时的增长率低于 3.5% 的最优增长率，这种比例延迟到 1991 年受到各项广泛的经济改革的支撑后才能摆脱出来。1980 年，当 Hindu 增长率论点被延长时，在增加储蓄和投资比例在经济中占 GDP 的差不多 25%，印度 GDP 增长率已摆脱 3.5% 的增长率，增加到 5.5%。尽管 1991 年提出的各项经济改革，印度年均增长率仍达不到 6%，最近 5 年（2003-2008）目睹巨大的突破，在继续提高储蓄和投资比例占 GDP 的 35% 的支撑下，印度经济增长率达到 8.8% 并成为排在中国之后的世界上第二经济快速增长国家

改革不是 1990 年才开始，而早在十年前，当政府逐渐放松对工业行业和控制。成功的基础起源于 1960 年代，这时已建立多个工业和管理研究机构，开始实施绿色革命来促进农业效率，结束缺少粮食状况等。中产阶级也不突然地出现，而是按阶段逐渐发展起来，到 1980 年代达到相当大的数量（根据市场规模的观点）

### 越南：对基本经济原则进行调整

1975 年战争结束后，越南是一个贫穷的经济体，其有名的出口资源是大量的移民跑到国外去。自从 1986 年越南政府实施革新政策，消除农业集体化并把它改变为私人所有制以来，越南经济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实际上，很多“船民”已经回国，争取越南发展前景

1980 年代中期，在苏联正瓦解并拿走最后的援助的背景下，曾经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米出口大国的越南，当时要进口年均 150 吨米来避免大面积的饥荒现象。这次危机为执政党的共产党革命家创造一个机会，让他们取得从失败的高度集中经济体转到市场经济体的转型的支持。最初的政策允许把国家经济管理体制分级，放权给地方管理工业行业；把行政管理办法改为各项经济机制，包括：以控制通货膨胀的以市场为导向的金融政策；允许汇率，利率与市场的各项条件相适应通过对外经济关系中的各项外向型政策；制定具有长期土地所有权的农业政策，鼓励投资；把私营成分视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允许国有和

私营工业行业与海外伙伴进行直接进出口交易。随后的革新所采取的措施包括：修改外投资法，确实消除一切直接补贴和控制价格体制，开放银行领域，让外商参与投资，建立 100%的外资出口加工区，取消大多数官僚集中体制，把于 1975 年统一以后被没收或国有化的生产厂还给原所有者或他们承继人，一个条件是他们对企业进行投资

这些改革措施所取得的结果是：目前越南成为世界第二米出口大国，世界第二咖啡出口大国和世界第一 Robusta 豆出口大国。在过去十年内，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 7.5%，其经济增长动力来自从小型纺织企业到总投资额为 10 亿美元的 Intel 新半导体生产厂-巨大的微芯片生产厂的单项外国投资项目等制造商。此外，与 13 亿人口的北方邻居的中国不同，8600 万越南人民在摆脱贫困和维护社会团结已经做到了一项可佩服的事。例如，越南的基尼系数（评价收入不公正系数）平稳地保持在 37 的数字，然而，中国的基尼系数越来越高，目前为 47。这是因为越南的中产阶级稳定发展，与此同时越南的贫困人口比例已从 1990 年的 75%以上落下到 2007 年的 14%，这一成就被世界银行称为“有史以来最成功的抵制贫穷运动之一”。国家电气化运动已经送电到 90%用户。大多数小孩们有初中以上的文化水平，2/3 高中毕业。国家失业保险制度计划预计 2009 出台

越南给其他结束冲突和滞后的经济国家的经验表明，制定正确的基本经济原则可以解放国家的增长潜力。

贸易整合为具有贱价的货物和服务的国家带来利益。与全球经济更开放的发展中国家增长得更快。这不等于整合会减少不公正现象；实际上，经济整合会拉大收入差距。但是，全球贸易对在劳动力，原材料，土地，资本等赋有的区域带来最大的利益，非洲在劳动资源，原料和土地等方面也很丰富。采取贸易保护政策不是非洲的嗜好，非洲要采取其他政策来保护幼稚的工业行业并减少收入不公正的带来的冲击

### **哥斯达黎加：从咖啡到电脑的芯片**

二十年来，哥斯达黎加的经济年均增长率达 5%，从农业经济体转向服务和高新工业经济体：从咖啡生产转向电脑的芯片的生产，医疗设备和高质量的服务

业。目前，有许多包括 Intel 在内的世界现代生产厂在哥斯达黎加成立生产机构，占全世界 25% 的电脑芯片产量。出口金额年均增长率达到 10%，从 25 年前的 8.7 亿美元增加到 2008 年的 100 亿美元，对人口为 4,00 万人的经济体来说，这是异常的增长速度。过去曾经占出口总额的 2/3 的农业行业也不被忽视，现在也得到多样化和增加输出产品种类，但其在出口总额所占的比例已减少为 14%。目前，哥斯达黎加的人均农业出口产值排在世界第 6 位。关键的教训是这依靠以贸易和资本的开放，利用智慧和合适的政策作为主要工具来实现的。实际上，象哥斯达黎那样在改革和增长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功给人们带来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让各国去问自己：他们能做好什么？

国际经验指出，政策上的变化可以改善各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萨尔瓦多的转型是在内战结束，国内稳定，私有化的基础上，通过对基础设施进行大量投资，把区域位置变为优势来实现的。格鲁吉亚和印度都是说明从取消各种规定所取得的利益的好例子。越南例子显示私有制的重要性，海外生活的越侨的参与是提高产量和投资的重要措施。哥斯达黎加的例子表明如何多样化而仍保存强有力的货物领域。上述的例子显示私营成分成为摆脱贫困的动力，政府要支持这一转型。

当然，改革程序将根据各国的比较优势和自然优势上的差异来进行。这是没有各国政府都能采取来管理的一览表的原因

### 接受差异

然而，可以为所有改革家建立一些共同原则，不过这些原则要符合每个地区的具体情况。非洲的一些挑战是全区域性的，比如：增长率依靠原料价格，昂贵的服务支出，缺少基础设施，低素质的技能，人口猛增等

### 差异的非洲

五十年来在非洲产生的最重要倾向是各国之间经济成就的差异越来越增加。波扎那和毛里求斯依靠好的管理而在很大的程度上已改善了人均收入。这些国家为自己的公民办了一项好事，不过因为它们都是很小的国家，其例子对其他区域的影响范围不广泛。

## 建立一个具有竞争力的非洲的议事日程

包括迦纳，纳米比亚，莫桑比克和南非在内的其他一些国家具体化管理的重要改善，甚至它们还没取得大的经济利益。较多的非洲国家已采取各项经济改革措施，但是没有全面地体制化管理议事日程以便促进经济发展动机。这些国家在最近的货物急速发展过程得到增长，但是目前要面对它们的原料出口价格下降的经济格局

一些非洲国家如刚果民主共和国，赖比瑞亚，塞拉利昂和津巴布韦已经过在基本体制方面相对的衰减，这些国家的国民忍受冲突和管理的薄弱，引起增加贫困人口的局面，尽管一些国家如赖比瑞亚正成功地摆脱这一局面。包括安哥拉，赤道几内亚和尼日利亚在内的非洲石油生产国跟其他国家有相对大的差异，因为石油给领导班子带来巨额利润，并不鼓舞促进一个好的管理体系和经济多样化，尽管石油将永远不能带动全部国家富裕起来

这种差异可以指导对非洲建立关系；没有一个接近的方式也指出为什么非洲所取得的利益常常被放过

在非洲有多种政治制度的国家，从在实施经济改革取得相当的进步的国家，还没有完整改革计划的国家，到因为从碳氢化合物资源收巨额外汇的石油生产而要抵抗实施改革的压力的国家

每个国家要面对减少费用和变为有竞争力的不同挑战。已进行改革的国家现在要大力争取利用外资。还没进行重大改革的国家至少要努力向国内经济的正规领域给与优惠。其他石油和自然资源生产国也要勤奋地工作来保证他们的主要出口资源不能压倒经济体，若在别的地方进行经营活动将忍受很高的费用

### 未来的议事日程

### 竞争的政策目标

发展的争论不再提到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平衡，而关于要有更多的市场的必求和各国政府运行得更加有效等问题。国内外企业都受到非洲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

建立一个具有竞争力的非洲的议事日程

### 通过竞争求发展要求：

- ◆ 一个对经济体的支出机构的分析和先解决最突出的问题的承诺
- ◆ 将国家竞争力定位在政治争论的中心。在区域和国际范围增加竞争力要成为一个关键的政治目标，得到选举人的认可和被各政治党派之间进行斗争
- ◆ 一个连续发现能在不断发生变化的国际经济背景下的经济体内部的竞争领域的过程

### 非洲政府要做什么

非洲各国政府要确定增长机会并鼓励对国内发展的竞争。这些国家的公民要认识到他们正与其余的世界竞争。这要求改变发展政策制定者的注意力从集中于援助和援助家转向投资和经营。

#### 竞争的各项准则

非洲发展重想的一部分要与支持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的竞争准则，一种“关于竞争力的千年发展目标”。通过把经济革新的各种措施和增强行政效率结合在一起，这种目标将在制定各类使各国发展经营的条件，从而找到摆脱贫困的道路的工作中发挥重要帮助。这个目标提到商人视为经营活动中最重要的阻碍的指数，例如：资本费用，电能，交通，通讯，税收，劳动和腐败。它将继续并把世界银行和包括世界经济论坛在内的其他组织的关于具体化在非洲经营的阻碍的有关项目加以综合，在它们之间进行比较并与世界其余部分相比较

因此，非洲各国政府要：

- ◆ 在国内发展的争论中要当家作主
- ◆ 让政府有时间来鼓励投资，不对援助项目进行谈判。重要的是给投资者而不是援助者建立简化机制
- ◆ 保证包括正确的货币，贸易和财政政策在内的合理的宏观经济指数
- ◆ 简化企业的行为准则
- ◆ 保证税收规定和政策变化的预计能力
- ◆ 建设可以为中小型客户，企业和个人客户等服务的健康信用市场
- ◆ 保证具有竞争力的汇率

### 保证一个具有竞争力的汇率

尽管当一个国家已获得国内的竞争力，它在国际市场上经营的货物价格取决于汇率。过高的汇率可以取消国内竞争利益并继续制约出口的成功。大多数经济增长快速的发展中国家都以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和快速增长的出口速度来赢得一个成功的经济阶段。日本，韩国，台湾，智利和马来西亚都以低的汇率赢得高速增长阶段。同样，中国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受到最初低比例货币的支持，中国的出口快速增长和大力抵抗其全球竞争力的衰减是货币升值的结果。反而，贫穷的经济成绩常常被归于在赏收暂时的高价格的货物国家内的过高汇率（下面提到的“荷兰疫病”），或由高利率引起的短期资本的流入或相当的援助资源

保持具有竞争力的汇率需要有慎重的政策反应，因为当一个国家在出口方面更获得成功，其货币价值就更强。阻止货币升值的各种政策包括：中央银行买外汇储存，阻止短期资金流入的政策，开放国内市场来鼓励进口和外资

此外，非洲政府要集中：

- ◆ 确定最强有力的比较优势的领域并从中受益，包括：旅游和其它服务业，开拓自然资源和农历。
- ◆ 建设基础设施来增加效率
- ◆ 专业化并非政治化行政体制
- ◆ 规范化国家竞争能力，与世界其余部分向比较
- ◆ 反对各垄断集团，尤其是跟政治有关的集团，一如既往地把消费者的利益放在生产者利益之上；这使得生产家变为具有更强的竞争力
- ◆ 减少在正式领域内的合法化和经营活动的费用，同时增加保持非正式的经营交易的费用
- ◆ 要与在海外生活的非洲人联系，而不要对智慧失流现象担心。要积极与有才干的人接触，通过工艺，财政流入和技能等来改善非洲的竞争力，同时使他们对所在国向非洲支持。例如，只在美国就有 130 万非洲人。他们只占在海外出生的美国人的 3.6%，但是，自从 2000 年，这一数字占合法入境人数的 17.7%
- ◆ 鼓励税收和主要利率通过增加改善基础设施和政府的服务业所取得的利益

## ◆ 发展“新农业”,不过要了解取得成功的必要支持和投资方式

**非洲“新农业”的核心**

尽管自然资源的优势，非洲各国的农业领域常常是世界上运行最欠的。其中，在非洲撒哈拉 附近地区的 48 经济体中，35 个国家要进口食品。反而，在过去四十年内，东亚国家的农业产量已经增加了四倍。非洲处在滞后局面，其农业产量没有产生巨大的变化

低效率和薄弱的基础设施，国内市场疲软造成非洲发展的危机，这使剩余的货物转到城市遇到很大的困难。加上贵昂的食品价格，这象催化剂一样对特别在城市环境中的政治紧张局面造成危害的冲击。但是，目前人们对造成“绿色革命”的条件已有清楚的认识。正如 Rockefeller 基金所作的总结，它要求以下的要素：

- 通过研究应用，更多效率、更高的农历产品和化肥
- 在植物科学，农业和经营政策的地方人才
- 各国政府的承诺
- 政府和非政府成分在基础设施，水资源，水利和环境等方面的合作；和
- 市场开拓

要强调农业和贸易活动之间的直接联系。对差不多一半的 Sahara 附近国家来说，运载的费用占出口收汇的 20%。对一些内陆的国家来说，这一费用占出口收汇的 50%。极为突出的是贫困的交通基础设施对农村发展的负面冲击，使得非洲农民难以集中于对出口具有高价值的农业产品。这不仅由于基础设施薄弱的运载费用，而且还因为低效率的海关机构和各种通关手续的贸易费用，这本身又是官僚独断，低效率、非竞争力思维和政策环境的体系，不可避免的食品涨价状况为非洲造成政治危机，和若农业能恢复的对 1，8 亿农民带来经商机会的两个相反倾向的结合。非洲将落入异常悲剧如果他们错过机遇，面对危机

建立一个具有竞争力的非洲的议事日程

## 私营所有制和非政府组织的角色

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依赖于政府的政策和行动。但是，各非政府组织，基金和慈善家可以提供帮助

公民社会可以给改革带来动力并对行使权加以监督。不过，公民社会组织也要：

- ◆ 使对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等其他成分的行使规则合理化并加以认可，同时要承认通过减少经营支出来提高竞争力的国家需求
- ◆ 在经济教育和支持商人建立自己的经营计划等方面发挥更重要的角色。
- ◆ 为立法者和国务院职员提供在竞争经营环境中的法律和管理角色等方面的培训
- ◆ 指出如何使消费者，劳动者和环境得到保护而不要把过分贵昂的费用强加给经营活动
- ◆ 把政策焦点集中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分割

## 更有效的援助管理方式

由于发展是一个政治的过程，其成功取决于地方所有权；非洲政策制定者而不是援助者要提出各类优先。各类优先要根据每个国家的国情来确定。为了找到政府所需的和援助者想共给的平衡，援助者要：

- ◆ 支持国家的增长和减少支出的各项议事日程，避免从外部设计各项日程或寻找“完美”的政策措施
- ◆ 与国际财政体系相配合，注意对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政府支出不给与限制
- ◆ 与私营成分配合共同建设基础设施。
- ◆ 认可并避免援助的负面冲击，其中包括“荷兰疫病”和汇率的通货膨胀，同时为援助者而不是对经营的忧虑和需求夺取各种资源

### 回避“荷兰疫病”

荷兰疫病术语起源于 1960 年在荷兰发生的、来自在北海发现的气田导致荷兰货币升值，非石油产品在全球市场范围内的出口变得具有很弱的竞争力的危机。相同的局面也于 1970 年代在英国发生的，由北海石油所导致的。荷兰疫

## 建立一个具有竞争力的非洲的议事日程

病主要与自然资源的冲击有关，对赋有自然资源的非洲国家来说，这种疫病是值得关心的。此外，荷兰疫病还起源于包括外资直接投资和援助在内的外汇猛增。由于实际汇率增加所导致的进口的增加和出口的下降可以使生产活动被转移到具有更低的费用国家。

**减低荷兰疫病导致的危机的三个基本措施**

第一，慢化实际汇率增长数度通过“分散”收入，不立即把全部收入带回国，节省并分善收入以便保证稳定的收入。第二战略是避免使实际汇率增加通过增加经济体制中的内地储蓄，以便减少巨额资本投入。如果一个国家有足够的预算剩余就可以实施这一战略。一个国家可以鼓励个人和企业增加储蓄款通过减少所得税和经营税。增加储蓄可以减少贷款的需求来负担政府的赤字款项和外资直接投资。第三措施是通过增强对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投入来增加制造领域的竞争力

一般地说，避免荷兰疫病最重要的是管理。可以通过保证合理的经济原则来避免谋求利润并对货币采取过分评价态度：正确的货币政策，投资机制和开放贸易，透明的反腐败法，法律原则，在人力资源，医疗和基础设施等方面进行长期投入

**面向一个具有竞争力的非洲**

非洲可以通过在全陆地范围内建立起“增长联盟”来创造面向经济成功的道路。这是没有前例的挑战：在一段时间内，非洲要消除对改革和投资的各种壁垒，与欧洲，甚至亚洲经济增长历史作比较。而且，非洲要在全球经济动荡的时刻加以行动。

**在非洲建设各个增长联盟**

非洲的增长经常是全球货物价格的函数。要把它变成在应用人力资源投入生产并卖出给国际市场的发展基础上的自制力量，要花很长时间。长期的增长动力来自别的地方。

要进行改革。每个国家是国内的演员、双方和多方援助组织、非政府组织、咨询者、外国发展基金的狭窄舞台。这种刺耳的声音可以压倒并失去方向，常常成为维护政治权力的工具而不是像当初预计的经费资源和咨询发展。这些体制常常把政治领导者的注意力转到实际问题，而不是促进增长。

目前，国际社会正处于第五十年提供给非洲的国际发展援助并正形成模范。这些模范是大型国际援助组织的思想和行动的相似倾向。一般地说，发展援助的历史可以被总结为从资源共给（从 1960 年代中期到 1980 年代中期），政策共给（1980 年代中期到 2000 年）到展开这些政策的能力（从 1995 年到 2005 年）的连续性焦点。最近几年，焦点又返回资源身上，最普遍的是在各项国际论坛中提出来的数量指标，并把它转换为在区域内大规模的预算援助。这种循环可以持续延长下去，其结果将造成失望。这不是由于主要援助者的经济推论的错误：资源，政策和展开能力确实是达到增长的要素。但如果一个国家领导人确定其他优先，这些输入仍不产生结果。

那就是失控的角色：领导班子的优先。增长作为一种优先，资源可以得到动员，政策被制定，新的措施被提出来支持展开。当其他优先支配的时候，增长受到阻碍并使外行的人难以理解。这些导致给增长增添优先，并表明一个管理所需要的联盟在其他条件的基础上而不是在增长的基础上形成。各政治动力经常被混合起来，当一个国家在国内形成一个对增长有足够拉动力的联盟时，增长导向政策才能有足够的决心来实施。

当多方和双方组织在建立起增长联盟方面没有取得成功，我们也不吃惊。其原因在于这些组织在基本上是专家治国论的，授主权的约束。然而，联盟建设仍是一种基本的政治运动

非洲能够实现繁荣和稳定的唯一一条路就是当在该陆地进行经营活动的一切商人不受政府的约束，他们对自己生产并卖出给世界市场有最初的认识。成功将要求政府采取行动：除了为减少在经营活动中所需的费用和限制的特定政策之外，也要对人力资源和物资加以投资，

## 基乌湖共识

### 建立一个具有竞争力的非洲的议事日程

援助者要抑制他们的过急于代替非洲回答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是非洲要自己办自己的事，甚至他们做得比他们想做的事还少。非洲政府要同企业商人，立法者和公民社会配合行动才能建立起遇到很多困难的发展道路的必要政治联盟

在许多非洲国家，改革和盛旺的对话还没开始，基乌共识是这一梯子的一个步骤

\* \* \*

## 建立一个具有竞争力的非洲的议事日程

## 附件：代表名单\*

Alan Gelb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South Africa
Alberto Trejos	INCAE, Costa Rica
Alex Sokoloff	US Embassy: Rwanda, United States
Andres Rozental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Mexico
Andrew Rugasira	Good African Coffee, Uganda
Ann Bernstein	Centre for Development Enterprise, South Africa
Annette Schwarzbauer	Konrad Adenauer Stiftung, Germany
Antoinette Mokoghloa	Pamuzinda Productions, South Africa
Anton Bosl	Konrad Adenauer Stiftung: Namibia, Germany
Betty Maina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 Kenya
Casper Klynge	Africa Commission, Denmark
Dan Makokera*	Pamuzinda Productions, Zimbabwe
Dianna Games	Africa@Work: South Africa, Zimbabwe
Erastus Mwencha	Commission of the African Union: Ethiopia, Tanzania
Fatima Harrak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Mohammed V, Morocco
Frank Spengler	Konrad Adenauer Stiftung, Germany
Greg Mills*	The Brenthurst Foundation, South Africa
Holger Hansen*	Centre of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Denmark
Hyuha Mukwanason	African Economic Research Consortium: Kenya, Uganda
James Kibera*	Mzima Ltd, Kenya
Jeffrey Herbst*	Miami University, United States
Jennifer Oppenheimer	The Brenthurst Foundation: South Africa, United States
John Williamson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United Kingdom
Jonathan Oppenheimer	DB Investments, South Africa
Kipyego Cheluget	Foreign Service Training Institute, Kenya
Klaus Rudischhauser	European Commission: Brussels, Germany
Mark Bellamy	African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United States
Markus Lackamp	Political Programmes and Analyses: Christian Democratic Union, Germany
Martin Kimani*	<i>The East African</i> , Kenya
Mauro De Lorenzo*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United States
Michael Spicer*	Business Leadership SA, South Africa
Mohammed Dahbi	Al Akhawayn University, Morocco
Morten Elkjaer	Africa Commission, Denmark
Mundia Kabinga	University of the Copperbelt, Zambia
Natty B Davis	Presidential Adviser and Minister, Liberia
Patrick Mazimhaka*	The Brenthurst Foundation, Rwanda
Paul Kagame	President, Rwanda
J Peter Pham*	James Madison University, United States
Peter Zeng	Chinese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ina
Robert Sithebe*	KPMG, Swaziland
Sheila Khama	De Beers, Botswana
Simon Rutega	Uganda Securities Exchange, Uganda
Stefan Mair	Stiftun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Germany
Stephan Malherbe*	Genesis Analytics, South Africa
Stephen Karingi	UN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frica: Ethiopia, Kenya
Steve Caley	Fina Bank: Rwanda, United Kingdom
Stuart Symington	Ambassador to Rwanda, United States
Tan Khee Giap	S Rajara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Singapore
Terence McNamee*	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 United Kingdom, Canada
Thomas Claiborne	E Oppenheimer & Son: South Africa, United States
Thomas Nzaritimana*	TransAfrika Resources: South Africa,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Thomas Vester Nielsen	BankInvest, Denmark
TN Ninan	<i>Business Standard</i> , India
Tumenta Kennedy	Wittenberg Center for Global Ethics: Germany, Cameroon
Victor Ngezayo	Group Ngezayo,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Witney Schneidman	Schneidman and Associates, United States

\* 意思是参加 2008 年 5 月和 12 月举行的两次会议；没有\*的意思是参加一次会议。排在右边最后国家名字就是代表国籍